

臺灣無性戀現身經驗之初探

李亭萱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灣無性戀現身經驗，邀請6位無性戀者進行訪談，不聚焦單一現身對象，以開放地態度蒐集與探究資料，以「敘事研究取向」視框進行資料分析，試圖理解無性戀之現身經驗為何？研究結果有三：（一）無性戀能見度低影響現身經驗，包含需要解釋「什麼是無性戀」、現身是多次反覆全面性的行動、難以被理解；（二）臺灣同性婚姻對於無性戀現身經驗獨具意義，包含評估欲現身對象的酷兒知能與開放度、實踐社會正義、大幅降低被病理化的思維；（三）向伴侶現身尤為挑戰，包含避免錯誤期待、考量現身風險。最後，依據研究結果與文獻對話給予未來研究與實務建議，包含（一）研究建議：聚焦於無性戀像伴侶現身議題；（二）實務建議：在教育或教學現場，提供教師與學生「無性戀」概念，以提升無性戀的能見度；在諮詢實務的現場，實務工作者要積極反思自身的「性價值觀」，以及擴展「性相關議題」之視框，除了增加對各個性傾向關注度之外，必須胸懷性少數的多樣性，避免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才不致在助人工作的成效上陷入盲點與困境，對性少數與臺灣整體社會有所貢獻。

關鍵詞：出櫃、性吸引、現身、無性戀、臺灣

李亭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通訊作者：lee_ting_hsuan@yahoo.com.tw）



壹、緒論

根據研究指出，同志與性少數族群肯認身分，開放身分有助於降低憂鬱，提升幸福感（Forenza, 2017; Riggle et al., 2017）。通常會向家庭現身的同志，在公領域也會公開身分，身心較為健康（Henderson, 1998）。多篇文獻指出：性少數因為擔心歧視而選擇隱藏身分，部分性少數會在現身之後遭受攻擊、失去人際關係，被視為疾病，有將近半數的性少數會以假裝沒有這件事發生、最小化他人的惡意，或以自我譴責的方式重新解釋負向經驗（劉安真, 2017; Barefoot et al., 2017; Eaton & Rios, 2017; Goldberg et al., 2017）。面對不友善的環境，性少數容易自尊低落，罹患精神疾病，甚至自殺（王建權，2019；McKay & Watson, 2020），關注性少數現身處境是心理健康至關重要的議題。

臺灣是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性別思潮先進，本文欲探討的對象無性戀（asexual）為性少數一類，多元性別 LGBTQIA（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Intersex, & Asexual）的最後一個縮寫“A”，是獨立於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之外的第四個性傾向。臺灣無性戀社群自 2014 年開始，常與雙性戀社群“Bi the way”組成隊伍，參與多屆的臺灣同志大遊行，並時常舉辦在地的性別講座與茶會，促進大眾認識性少數，為平權發聲，共同推進臺灣整體社會性別意識，實踐社會正義不遺餘力。然而，無性戀一詞卻鮮少被人所知。

根據全球公認的無性戀網站 AVEN (Asexual Visibility and Education Network) 將其定義為：

一個人不感受性吸引。這是一個性傾向，不是自己的選擇（性禁慾）。

無性戀者對於性、戀愛、和性慾皆有不同的感受和想法。無性戀社群和一般人一樣是非常多元的。不比一般人好，也不比一般人差，他們只是不感受性吸引（引自無性戀網頁資訊，2024）。

「無性」概念已經存在已久，但「無性戀」作為一種身分卻是近 20 年的事，這相對於同志族群在 1973 年被精神診斷手冊去病化的時間，足足晚了半個世紀。無性戀的人口數較少，是性少數當中的更少數，僅占全人口的 1%，能見度低（Bogaert, 2004）。部分助人工作者僅止於「聽說」卻不知其所以然。事實上，有許多潛在無性戀者或有穩定認同的無性戀者，早已大大抱怨助人工作者對性少數的無知，難以真正給予協助。一篇來自《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的報導，作者身為一名無性戀者，曾向治療師現身時收到：「我不相信有人是無性戀」的回應，作者分享當時因為擔心關係衝突，擺盪於堅持身分或隱藏自己的矛盾情緒中，也知覺到個案在面對權力位階較高的專業人員時，自己的觀點很容易被貶低的處境（Kim, 2015）。雖然該篇報導的最後，治療師在作者找到無性戀社群之後，願意肯認無性戀身分，也願意好好聽作者說話，但這卻是個案萬萬不該承受的風險，也是助人工作者斷斷不該有的行為。



一、無性戀社群的出現與形成

起初無性戀一詞是由美國大學生 David Jay 於 2001 年在其個人網頁上展示開始，文章闡述其在青少年階段，發現自己無性的現實狀態，開始思考無性戀的發展，該篇簡介篇幅雖然小但引起世界各地相當多人迴響，慢慢地發展成現在大眾看見提升無性戀能見度與教育的平台 AVEN（無性戀網頁資訊，2024）。

雖然無從得知無性戀知識如何被引進臺灣？社群是如何被建構？但就研究者搜尋結果發現，最早出現於網路社群平台的是翻譯 AVEN 的中文社群（<http://zh.aseuality.org/>），該網頁並未詳載創建歷史，僅說明 2006 年網頁因為技術問題而無法維持，但重啓於 2014 年。由此可以推測：無性戀資訊早在 2006 年之前就已經被引進臺灣，但因資源不足的關係而無法持續經營，仔細計算至今也有 16 年之久，而近年來臺灣有 2 個無性戀社群特別受到歡迎，分別是 2013 年成立的 Facebook「臺灣無性戀小組」(Taiwan Asexual Group) 粉絲專頁與 2016 年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電子布告欄系統「Asexual 版」，兩個平台的使用人數穩定增加，定期有文章產出，回覆與留言具備一定的質量，網頁更新相對即時，是目前經營時間最久也較為活絡的社群。而以學生為主體的新平台 Dcard 也在 2017 年性別友善的「彩虹版」有了第一篇討論無性戀的文章，並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創立「無性戀版」，自開版以來持續累積多種內容，包括身分認同、各種性身分標籤的流動、親密關係、社會汙名等，可以想見青少年對於無性戀的關注程度大幅提升。

二、無性戀定義

第一篇無性戀研究是由 Bogaert (2004) 以「不感受到他人性吸引 (having no sexual attraction to a partner of either sex)」作為命題，針對 18,000 名英國人民進行人口普查，推估無性戀者占全體人口數的 1%，在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社經地位、宗教信仰、身體健康等表徵，初步了解無性的概況；第二篇研究也是同一位作者 Bogaert (2006) 試圖將無性戀作為一種性傾向 (sexual orientation) 進行討論，與許多大眾「已知」或「熟知」的概念相互對照，包括無性戀與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的差異，以及區辨無性戀者在 DSM 精神疾病診斷標準的性慾低下 (hypoactive sexual desire disorder)、戀童症 (pedophiles)、性偏離／性偏好 (paraphilia) 的不同，說明醫療體系過度病理化無性而狹隘了性身分的想像。該篇文獻有意識地將「無性」視為一種正常現象，並不是需要治療的狀態，將性身分往前更推進了一步。而接下來的許多研究圍繞著「什麼是無性戀」進行討論，包括與各個變項的關聯性 (Greaves et al., 2017; Prause & Graham, 2007)、發展各式量表測量誰是無性戀？(Bogaert, 2015; Yule et al., 2015)、反思研究方法的適切性，只關注性慾標準是合宜的嗎？(Hinderliter, 2009)，關注生活現象場和親密關係 (Brotto et al., 2010; Cowan & LeBlanc, 2018; Foster et al., 2019; Scherrer, 2008)，以及性困擾和性創傷 (Brotto et al., 2015) 等。



根據研究指出，自 2004-2021 年關於無性戀論文約 80 篇，回顧這 17 年來的文獻從 2013 年開始研究數量以 4 倍的速度急遽攀升，主要還是以「無性戀作為一性取向」作為首要發展課題，但近期關注社會性支持系統的文獻日益增加（尤千萍、施俊名，2022），雖然多數的研究還是圍繞著生物因素討論，猶如當初關注同性戀的初期，許多學者探尋「異性戀基因」和「同性戀基因」一般，思考這是先天使然，還是後天因素（Wheatner, 2018）？然而，隨著對無性戀的認識越來越多，學者們除了關注個體「性慾」之外，也開始關注無性戀「情感」的部分，將性吸引（sexual attraction）和浪漫／情感吸引（romantic/affectionate attraction）分開描述，發現不僅性吸引和浪漫吸引像光譜一般也有程度上的差異，無性戀群內的異質性高，也必須使用多軸線的方式理解，這影響了無性戀的身分認同與現身經驗（王泓亮，2014；李亭萱，2021；Carrigan, 2011; Cowan & LeBlanc, 2018; Foster et al., 2019）。

三、無性戀群內異質性高影響現身狀態

Carrigan (2011) 將無性戀群內異質性以表格的方式呈現分類，包含性吸引力的光譜：正向感受、中性感受、負向感受和抗性，闡述每個個體對性的感受不同，以及對浪漫愛吸引力的光譜：有浪漫愛無性戀（romantic asexual, RA），和無浪漫愛無性戀（aromantic asexual, AA），更將浪漫愛對象分為異性愛（heteroromantic）、同性愛（homoromantic）、雙性愛（biromantic）和泛性愛（panromantic）等，而不稱呼異性「戀」而是異性「愛」就是性與愛分開看待的思維，而 Brotto 等人 (2010) 特別關注「有浪漫愛無性戀」和「無浪漫愛無性戀」與伴侶互動的經驗，發現有浪漫愛無性戀和一般有性戀一樣，是期待有伴侶，情感被支持的，他們想要和人親近，但是不想要性，尤指性行為。他們理想關係的圖像是「和一般人談戀愛一樣，除了性」和「我愛他，但不是一個我目前需要發生性關係的人」；無浪漫愛無性戀對親密關係並不特別渴求，他們說自己既不希望發生性關係，也不希望進行浪漫的交互作用，認為自己期待的關係比較像是親密的朋友、知己，他們對理想關係的形容是「比朋友更多一點」。

無性戀群內異質性高也會影響其現身時如何向他者解釋自己。Cowan 和 LeBlanc (2018) 發現無性戀現身時，會用更多的形容補充自己的狀況，例如「我極少感受到他人的性吸引，但在特別的場域可能會被喚起」或「我對一個人有深層情緒連結的時候，也可能有性的激發，但不常被喚起」等，個體需要在單一經驗上不斷呈現更貼近自己的狀況。這在無性戀社群裡也可以窺得同樣的情況，舉例來說，無性戀者在發表文章時常在開頭的起手式談「我是生理男性、浪漫愛對象是男性、傾向 RA、喜歡動漫…」等，以多軸線的方式介紹自己。

Galupo 等人 (2015) 指出性少數為了要向一般社會大眾解釋自己，常有以單一身分說明其經驗卻無法貼近整體生活狀況的困境，更提出了性身分可能有主要認同（primary sexual identity）與第二認同（secondary sexual identity）雙重交織的狀況，例如，女同志將無性戀也納為性身分時，被問及性傾向時一時難以解



釋，只好用同性戀作為標誌，再用各種方式呈現自己的經驗；而王泓亮（2014）發現當無性戀難以詳盡地描述身分時，可能選擇隱瞞某些部分，僅提供對方可理解且符合自己狀態的方式現身，有時會以浪漫愛做為策略性現身的基準，而這並非是「隱身」的思維，而是因為難以解釋身分而有所選擇。

Mollet (2023) 以「策略性身分管理 (strategic identity management)」的概念，訪談了 12 位無性戀大學生現身經驗，發現無性戀大學生出櫃並不會像同志出櫃一樣，有著「爆炸性的結果」，如被逐出家門，向朋友們現身也會用「直接現身」的方式說明，但因為無性戀概念難以讓每個人皆理解，受訪者常常在解釋之後還是被視為是異性戀，但為了要政治正確，無性戀大學生會自稱「酷兒」或是隱而不談；Foster 等人 (2019) 更進一步說明多重交織身分的性少數，現身態度不一，該篇研究將「有色人種、無性戀、女性」三個元素放置在一起，了解多重交織身分的無性戀會如何現身，結果說明部分無性戀認為有必要積極現身有助於實踐社會正義，替無性戀倡議，另一部分的無性戀認為沒有必要現身，並可視環境的友善程度「彈性」現身，解釋「無」和「沒有」難以彰顯的困境，例如膚色、性別、喜歡什麼，是看的見的「有」。說明要一個人理解「有」比較容易，理解「無」卻是一件困難的事。由以上可得知，無性戀的現身動機、現身態度、現身意願會因為各種因素而有多元的考量。

四、現身議題與「性別」有關

Gupta (2019) 深度訪談 30 位無性戀者生活經驗，發現無性戀身分認同與陽剛特質 (masculinity)、陰柔特質 (femininity) 和性別非常規 (gender non-conformity) 有關，舉例來說，男性在社會地位與事業有成的情境下，無性並不是一個議題，但在面對異性伴侶約會時，沒有「調情」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要讓對方「調情不是必要」是一種挑戰等，相反地，女性無性可能是可以被接受的，尤其是年紀較小的階段，但隨著當代性觀念開放，多位受訪者提到影集《慾望城市》的影響，無性戀女性的處境容易被邊緣化，其中白人中產階級女性更是嚴重。

李亭萱 (2021) 以十字象限的方式描繪不同向度的無性戀之現身處境，包含「異性愛男性 vs 異性愛女性」、「同性愛男性 vs 同性愛女性」和「雙性愛男性 vs 雙性愛女性」現身處境完全不同，除了強調以多軸線方式思考之外，必須同時關注「生理性別」與「浪漫愛對象」的性腳本，例如多數無性戀研究「性別」比例常是女性多於男性的狀態，似乎女性現身是較為容易的，或許是生理上造成的因素，但即便是生理上造成無性戀女性較多的情況，這也要無性戀女性有現身的意願才可獲得比例懸殊的數據。換個角度思考，臺灣無性戀於華人文化現身處境之探討也可能生理因素讓無性戀男性比例較少，再加上社會文化對男性之性腳本的想像，造成無性戀男性現身的意願更低。該篇文獻進一步指出「不為人知」是無性戀現身的另一種困境，除了容易被否認身分之外，亦容易收到他者以「你只是沒有好的性」的概念回應，可能出現性騷擾議題，如「你沒有試過，你怎麼會知道你沒感覺」、「你跟我做過之後，就知道自己不是無性戀了」等危機，除了降低



無性戀現身的動機之外，更必須面臨性騷擾相關法律的議題。

國內的研究也會以「性別」作為性傾向現身時的分水嶺，區辨男同志和女同志現身處境的不同。最早一篇向家人現身的實證研究，是以男同志為主體，發現男同志出櫃考量分為「自利導向」和「利他導向」兩種類型，前者擔心父母傷心失望而選擇隱身，後者擔心父母干涉自己的生活而有所隱瞞，男同志通常在「適婚年齡」必須抉擇是否現身，不管是現身考量、時機、策略皆圍繞著「傳宗接代」的責任（畢恆達，2003）。而女同志向家人現身之前，會隨著身分認同逐漸穩定之後先向朋友們現身，藉由培養經濟獨立爭取更多的自由，運用不說破、默認與心照不宣等策略，維持華人家庭和諧（李佩雯，2018；胡郁盈，2017；黃玲蘭，2005）。多篇文獻共同指出「手足」在家庭成員現身之後是一大助力，不僅能夠擔任協調者的角色，亦可以提供家長性別知識與資源（李佩雯，2018；黃玲蘭，2005；謝秋芳、趙淑珠，2016；Huang et al., 2016）。

雙性戀集中討論向「伴侶」現身的狀況，發現「性別」的作用力不容小覷。不僅是雙性戀「本身的性別」有影響，雙性戀者「喜歡對象的性別」也關係著雙性戀者現身程度的不同。根據研究發現：雙性戀男性傾向隱藏身分，擔心他者雙性戀恐懼症（biphobia），有時也會有內化恐雙的狀況，而現身對象通常是同性別的一方，意旨男性雙性戀通常只跟男朋友現身，而不跟女朋友現身（侯政男，2019；陳詩婷，2014；Schrimshaw et al., 2013），而雙性戀女性傾向開誠布公，通常在身分認同的過程中，就可能告訴伴侶，並期待伴侶能夠接納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衡量機制（紗娃·吉娃司，2009；張雅惠等人，2017）。整理不同性傾向的現身處境，原因在於無性戀的浪漫愛對象，包含異性愛、同性愛、雙性愛和泛性愛，具備相對應性傾向的現身處境作為先備知識，能更快速地連結無性戀的現身處境。性少數現身議題與性別、刻板印象、身心健康、現身對象、社會文化息息相關，富含多元訊息，必須審慎思考。無性戀與社群的互動性高，群內異質性可能影響其現身經驗，必須以多軸線的方式思考無性戀之性身分。

本研究以「現身」為主軸進行探究，主要原因在於性少數的自我認同和現身皆不是一步到位，是一個動態、連續性，不知何時停止的過程（李佩雯，2018；黃玲蘭，2005），欲瞭解無性戀面對每一次現身的考量、如何面對系統裡每個人的回應，以及現身之前後的發展結果為何？借鑒國內最早一篇性少數現身之實證研究，以現身考量、策略與後果作為關注的焦點，以設計訪談大綱（畢恆達，2003），研究者是以開放地態度探究蒐集資料，為了勾勒無性戀現身的全貌，並不特定聚焦特定單一現身對象，試圖理解其現身經驗，探究無性戀生活全貌。本研究欲回答之研究問題為「臺灣無性戀現身經驗為何？」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與招募

(一) 研究取向

本研究採用 Lieblich 等人（1998/2008）提出的敘事研究理論視框，透過敘說者以口語表達與故事敘說的方式，呈現其內在世界與生活經驗。研究者擇以「敘事研究」作為研究方法的原因是：

1. 敘事研究是了解無性戀者內在世界最清晰的管道

敘說者對其生活所經驗過的現實進行口語描述和故事敘說，不拘泥於「歷史性的真實」和「敘說者的真實」，而是深度理解個人在特定的情境脈絡及互動中建構自我意象，研究者陪伴無性戀受訪者不斷地敘說、修正、創造及再敘說，藉由一連串的故事理解其現身的故事內容，以及如何說故事（Lieblich et al., 1998/ 2008）。

2. 敘說的過程作為無性戀者發聲的方式

林美珠和溫錦真（2018）回顧台灣與諮商 67 篇敘事研究，發現性少數等殊異族群容易被主流排除、被邊緣化、被標籤化、被污名化，敘事研究藉由敘說過程將性少數的故事揭露於社會大眾，讓發聲有了合理性和正當性。而無性戀者的人口數少，受到異性戀霸權、有性戀強勢文化的影響，現身經驗受到社會壓迫，必然與其他三個性傾向不同，無性戀者若能從敘說故事和從故事裡獲得力量，使讀者與故事產生共鳴，這是敘事相當重要的歷程，也能凸顯敘事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二) 研究招募

由研究者自身人際網絡邀請小李作為前導研究之受訪者，在訪談之後，進行逐字稿謄寫、資料分析，撰寫初步分析報告，經由小李檢核是否如實呈現之後正式招募。本研究於無性戀社群張貼招募條件：(1) 18 歲以上；(2) 自我認同為無性戀者或暫時安頓自身為無性戀身分認同者；(3) 具有現身經驗者，曾至少用一種方式告知身邊的人或社群無性戀身分；(4) 願意配合研究錄音，資料分析後願意核對者。最後參與研究受訪者一共 6 位。基本資料如表 1。

表 1

無性戀受訪者基本資料

| 匿名 | 生理性別 | 年齡 | 自我認同 | 已現身對象 |
|-----------|------|----|-------------|------------------|
| 小李 | 女 | 29 | AA 或 RA 流動 | 姊、朋友、個人社群 |
| (N) | 女 | 27 | RA 雙性愛 | 母、朋友、個人社群、無性戀社群 |
| 小正 | 男 | 20 | RA 異性愛 | 朋友、無性戀社群 |
| 三花貓 | 女 | 41 | RA 泛性愛 | 小姑、朋友、個人社群、無性戀社群 |
| Frederick | 男／無 | 24 | RA 異性愛 | 朋友、伴侶、個人社群、無性戀社群 |
| 東東 | 女 | 19 | RA 偏 AA 泛性愛 | 母、朋友、無性戀社群 |



二、研究工具

(一) 研究者

研究者具備諮商心理師專技證照，長期關注性別、性少數議題，投注大量心力於性諮商學習，並具備性別教育課程教學經驗，有性別相關著作與期刊發表，有足夠能力進行訪談與資料處理分析。

(二) 協同資料分析者

偕同資料分析者為大學助理教授，長期參與多元文化諮商、女性主義家族治療、性別平等學術課程與學術研討會，有數篇質性研究論文發表，協助資料處理與分析，避免研究者資料分析的盲點，提升研究之嚴謹度。

(三) 訪談流程

研究者盡可能邀請不同類群之受訪者，並向受訪者說明研究倫理、研究目的、進行方式、簽訂研究同意書與保密契約之後進行訪談，正式訪談前，研究者皆透過網路傳遞訪談大綱，讓受訪者可以有意識回顧現身經驗，由於進行訪談時正值 COVID-19 期間，研究者以受訪者的需求為優先，分別選在線上或是安靜的咖啡廳進行訪談，只要清楚錄音即可。

(四) 訪談大綱

研究採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訪談大綱有（1）蒐集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群內自我認同、現身對象等；（2）現身經驗：包含對象、情境、互動方式、現身考量、策略與結果等；（3）補充任何現身經驗的特殊之處。

三、資料分析步驟

研究者先將個人生命故事視為一整體，浸潤在文本中反覆閱讀理解，形成一初始印象，了解無性戀於社會脈絡之現身處境，並將訪談資料轉為逐字稿編碼，如 A001、A002、A003…；接著，依照時間脈絡、刪除贅字與無關連結詞，重新改寫替代文本，另行編碼為 B01、B02、B03…，進行主題、次主題與核心主題分析，此時會註記在個別受訪者文本前註記其提供的匿名：如李-B01、正-B08、東-B11 等…，研究者在部分與整體文本間閱讀與思索，不斷重新建構與命名，來回調整核心主題。協同分析者以協助閱讀單一替代文本，以及討論核心主題最後，進行跨個案分析。兩人確定核心主題之後，再由研究者撰寫研究報告。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有三：（一）無性戀能見度低影響現身經驗，包含需要解釋「什麼是無性戀」、現身是多次反覆全面性的行動、現身後難以被理解；（二）臺灣同性婚姻對於無性戀現身經驗獨具意義，包含評估欲現身對象的酷兒知能與開放



度、實踐社會正義、大幅降低被病理化的機率；（三）向伴侶現身尤為挑戰，包含避免錯誤期待、考量現身風險、趨近理想關係。以下分點呈現分析內容：

一、無性戀能見度低影響現身經驗

（一）需要解釋「什麼是無性戀」

受訪者 Frederick 認為無須跟家人現身，因為父母沒有辦法理解無性戀是什麼？

我的爸爸媽媽應該也會想要我結婚生子吧，但是我覺得我有自己的生活，…，我是偏向 RA 這一型的，基本上跟一般人沒有差別，也沒有甚麼好討論的，…，因為我覺得他們也只會聽不懂（F-B01）。

小李和東東認為無性戀的解釋起來較為麻煩，因此會視對方的狀態而決定是否現身。

說實在的這個名詞可能對大家來講真的太冷門了，我今天甚至想說，如果我今天不是心理系的學生，我可能連這個東西都不知道，…我怎麼去理解這個東西（李-B24）；

我覺得我不是不講，是因為很多人不知道那是啥，假設我今天是同性戀，可以很直接地跟大家說，…，但是「我是無性戀」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是什麼，解釋起來很累啦（東-B17、B30）。

（二）現身是多次反覆全面性的行動

多位受訪者表示會善用各類隱喻、用對方懂得的概念開始談起。也有受訪者在不同時期多次、反覆、不斷地解釋什麼是無性戀，自己就是無性戀，要對方理解自己的狀態。

舉例來說（N）的父母都是留學的博士，思維相當先進，也理解 LGBT 性少數族群，（N）嘗試以各種方式解釋，但效果不彰。

我覺得在現身過程中加上一點點過程的輔佐，或者是像我跟你在講話的時候加上一點點比喻，就會有點讓人家更好理解。…，你要用他們的語言跟他們講（（N）-B32、B33）；

對我而言，它（性）並不是一個交往或是戀愛中必有的條件，有點像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一個人，跟對方去看一部很難看的電影也無所謂。（（N）-B54）；

我媽曾經問我現在有沒有跟喜歡的男生，然後他又加一句，或是喜歡的女生，…我媽媽她可能認為我是雙性戀，…我媽媽還告訴我，有些比較封閉的人會講”left is right, right is wrong”，所以世界上有所謂比較保守，不能接受同性戀存在的人，但是那些人的想法是錯的（（N）-B09、B16）；

我跟我媽講無性戀，她沒有甚麼反應…，然後我就繼續跟她講一些，想要得到更多回饋，但是她就說『嗯』這樣子。所以，我到目前為止我還



不是很知道我媽的想法是什麼，…，無性戀可能超出她的理解範圍了((N)-B12)；

跟我媽講說，我有曾經想過跟這個人成為戀人之類的，因為我媽媽知道這個人的存在…。但是，我又沒辦法跟她講…得很清楚，…((N)-B13、B14)。

(三) 難以被理解

由於無性戀的概念並不普及，更有社群內異質性高因素，常讓現身對象難以理解受訪者的意思，在現身後容易不被當一回事、被忽視、陷入曖昧模糊，有聽沒有懂的狀態，受訪者遭受到面對同一個人，必須反覆不斷重複現身的困境。受訪者三花貓、東東、小正不限於現身對象是誰，都有相同的經驗：

我姑姑們後續的反應就是繼續把我當異性戀，還是會繼續關心我有沒有交男朋友，可能是他們無法理解無性戀是什麼吧，也沒有很放在心上(貓-B14)；

我朋友也是，雖然聽的當下他們有認真，但其實後來還是把我當異性戀。…最近我又再次地跟我朋友們講一次，就是同一批人再講一次，…，結果其中一個男生就說「無性戀是什麼？」就是整個像是沒有聽過一樣(貓-B020)。

東東和小正向朋友現身之後，也有不確定對方是否能理解的狀況：

我就是說「我並不想跟任何人發生關係，無論是男生或是女生。我不確定我國中同學懂不懂，但是我高中同學那個有懂(東-B17)；

講了之前和之後也沒有什麼變化，算是在我預料之中，如果他們知道無性戀那會是更好的，因為我可以不用重新解釋(正-B13、正-B14)。

二、「臺灣同性婚姻」對無性戀現身獨具意義

(一) 評估欲現身對象的酷兒知能與開放度

在呈現此段落之前，研究者先行說明為什麼將次主題命名為對「酷兒」知識的接受與開放程度，而不用「無性戀」、「同志」或「性別」等詞彙。

酷兒(Queer)一詞被指涉古怪、怪異、奇特、變態的意思，常與性和性別相關的意涵連結在一起。有些文獻將「不正常」的狀態與「精神分析」和「症狀」一起討論，對此詞彙帶有負向、羞辱、貶抑的意涵(Cavanagh, 2019; Nigianni & Voela, 2019)；有些文獻則討論兩者的定義與內涵，將「同志」與「酷兒」的差異，從初始階段有「同志=酷兒」的說法，或認為兩者的意涵有所重疊，至後期學者們將同志理解為有固定身分認同的人，擁抱身分認同的人，酷兒則是強調身分認同會變，被認定質疑身分認同的人，但仍認為是性少數大傘之下的不同態度(紀大偉, 2015)，然而，對於台灣性少數而言，酷兒勾連的意涵與「同志」有關，但未必有羞辱的意思，事實上真正具有羞辱記憶可能是娘娘腔、人妖、不男不女等詞彙，雖然「酷兒」的翻譯字源是 queer，但這表示不同文化的語言使用



者可以主動賦予詞彙新的情感與意義，不需要有統一性的解釋，也排除被動地討論詞句靜態的意涵，這是本土文化可以更新的部分（江河清，2019）。因此，就本研究的發現，研究者以「酷兒」命名可呼應上述給予詞彙新的情感與意義。

對研究者而言，使用「酷兒」一詞原因有三。其一是根據文獻的啓發。如 Mollet (2023) 針對無性戀現身經驗的研究，發現無性戀一詞因為太少人懂，也難以解釋清楚，因此，為了「政治正確」，無性戀者會以「酷兒（queer）」代表自己。而這個稱呼不僅可以統稱「非異性戀者」，也不用大費周折地向現身對象解釋卻不見其效果，是為無性戀者的一種現身的考量；其二則是本研究受訪者（N）的說法。（N）在逐字稿當中有多次以「酷兒」描述自己的經驗，並且在各個不同的經驗裡，包含期待現身對象對酷兒知識的理解程度，以及描述自己的酷兒朋友並不一定具備無性戀知能等，「我覺得要現身的對象需要具備對於酷兒族群基本的詞，還有不會對我加以批評的人，當然要這樣子才能成為朋友… ((N)-B13)」、「跟酷兒朋友現身也非常的簡單，…，因為你不能在胸前寫出我是同性戀，… ((N)-B19)」；其三是研究者認為「酷兒」知識更勝於同志、性別、無性戀等，奠基於上述兩個原因，酷兒更廣納了傳統性別、非二元性別、跨性別與同志等意涵，以此命名能更強調「無性戀」的概念超越性少數原本需要的知能，更具全面性、系統性、整體性。

本研究的受訪者會觀察欲現身對象的各種狀況，評估其對酷兒知識的接受和開放程度，而「臺灣同性婚姻」公投的態度是受訪者評估的重要指標。小正雖然知道父母對同性婚姻是採正面態度，但卻能細微地辨識父母是否能接受自己的子女是同志身分。

我沒有想要向我的家人現身，因為我知道他們的想法，…。我們家算是蠻保守的家庭，像是去年投票關於專法的事情，他們說他們願意投同意票讓同性戀結婚，但是他們不同意自己的小孩是同性戀，他們不想要我和我弟是（正-B04）。

小李的姊姊平日相處融洽，又在同性婚姻的立場與自己相同，也會共同遊說父母支持婚姻平權，因此小李在某次討論同性戀議題時向姊姊現身。

我姊姊算是蠻 open 的人，他覺得同性戀沒有什麼特別的。我那次跟她說，應該是…，在討論某一件事情，可能跟同性戀有關係吧，詳細的情形我有點忘記了耶，但是我就突然跟他說，我想跟你講一件事情，就是說我覺得我是無性戀這樣子（李-B20）。

（二）實踐社會正義

由於 6 位受訪者皆經歷臺灣討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歷史，社會整體主流聲音是異性戀才是人類唯一個性傾向，造成社會對立、環境不友善等。而有意思的是：有些受訪者並非為了「無性戀」本身進行社會倡議，而是為了支持「同性戀」主體而現身，並且表達多元的重要性。

我發表文章的重點是，我想要跟大家說「世界上本來就會有各個性傾向



的人，如果我不是以人而不是性別，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寫完之後，我才帶到『我是無性戀』(李-B23)；

我在 2016 年底的時候有在○○上現身，那時候大法官正在準備為同志婚姻釋憲，我的兩個室友是女同志伴侶，…，我能感覺到社會對同志有很強大的惡意，我覺得很難過，就寫了一篇自己的經歷，但我一開始就說我是無性戀（貓-B15、B16、B17）。

本研究受訪者會以「持續提升大眾性別與性傾向的意識」的方式為社會改革做努力。每個人選擇的方式不同，例如：積極現身、為婚姻平權和多元性別族群發聲等。(N) 表示自己在身分認同之前無法正確的命名自己感到挫折，常因為無法與有性戀一般所謂的正常交朋友而容易自責、自我懷疑等，但在身分認同之後，積極現身獨具意義。

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但積極現身對我來說有蠻大的意義，像是我首先能夠公開的講自己是無性戀，讓我覺得在生活上輕鬆很多，就是我終於有個概念可以叫自己，我記得一本書，在知識的不正義上面有講到，…，如果這一個問題沒有一個詞彙能夠形容它的話，它就沒有辦法達到正義，對我來說無性戀這個概念，就是為我伸張正義 ((N) -B19)。

除此之外，東東和 Frederick 認為擔任受訪者的角色，也可以提升一般大眾對無性戀的認識，相當期待研究的產出。

我很樂意讓人知道有這個性傾向，我覺得比起大家比較熟知的性傾向，「無性戀」對大家來說是比較陌生的，那最好根除懷疑（東-B12）；我最近有特別講說（在個人社交網路平台文章）「我要去成為研究的一部分」，但是我不記得有沒有人按讚了，其實我沒有注意，…可能大家都不太懂無性戀吧 (F-B14)。

(三) 大幅降低被病理化的機率

過去性少數現身容易被病理化，被歧視等（王泓亮，2014；李亭萱，2021）。Robbins 等人（2016）訪談 169 位無性戀者現身經驗，雖然無性戀者有較大的動機向 LGBTQ 的同儕現身，但不能期待每一位性少數都能理解，一位受訪者表示自己向同為性少數同儕們現身之後，身為女同志的朋友說「你實在是太荒謬了…」，以及被某一位男同志朋友笑稱「無性戀不可能存在，因為每個人都想要幹另一個人」，同儕們因為不能理解而表現出「同情」的樣子。

這在三花貓向性別友善團體面試時，也曾經有相同的經驗：

我那個時候超傻眼的，但也不能怪他們，…，我告訴他們我是無性戀，覺得一個人很 OK，…。反正那位面試官是位男性，因為聽不懂無性戀這個名詞，就告訴我要去看醫生，而且我整個過程，都可以感受到一種很強烈的性慾，他們讓我覺得每個人都一定要有一段關係，包含性關係…，所以我講話的時候，他們就會有『嗯？』那是一種很強烈地被歧視的感覺…（貓-B22、B23、B24）。



三花貓表示早期無性戀的概念不為人知很容易被指責，被病理化，隨著臺灣整體社會對性少數較為關注、用心，慢慢地也會有友善單位到無性戀社團裡，邀請無性戀者現身說法，讓大眾更理解性少數的狀態，而當初指責自己的單位，近期也廣邀無性戀者進行座談，明顯能感受到身邊的人對性少數的友善程度。

三、無性戀向伴侶現身尤為挑戰

(一) 避免錯誤期待

無性戀受訪者在談及伴侶關係時，與一般性傾向一樣，常以「順其自然」呈現其狀態，並表示在交友軟體上標註無性戀身分是避免對方有錯誤期待，更進一步想達成的是「對方認識無性戀」。

我就直接在○○上面穩定掛上無性戀身分，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不用是朋友也看得到，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對我有興趣的話，你至少會看簡介（貓-B44）；

在交友軟體上，我的個人檔案是放無性戀，因為我不想要任何不知道我是無性戀的人來煩我，而且我在這種事情上，一開始就要講很清楚。我其實是放半性戀¹((N)-B44、B45)。

(二) 考量現身風險

本研究受訪者也考量了向伴侶現身的風險，如果會造成關係上的「麻煩」，受訪者傾向不說，若伴侶是可以接受的，受訪者反而期待開誠布公。

我覺得我會考慮的是，這件事講出來會不會變得很「麻煩」，因為我在性上面還是可以配合的，如果很麻煩的話，我就會選擇不說(F-B09、B10、B11)；

我跟他（男性伴侶）講他會胡思亂想的，就會覺得「吼～算了～」，但是他今天如果是一個正常人的話，我會跟他講的，但是他不是(東-B23)。

(三) 趨近理想關係

現身之後的結果，也能協助受訪者更趨近自己理想關係。受訪者認為現身之後可以更容易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可以幫自己營造較友善的環境，不論未來是否能夠發展成浪漫愛關係。

我有去○○的社團，居然遇到有一個男生在問：可不可以把夫妻關係和情侶關係分開來，就是生養小孩和浪漫伴侶是不同人，…我就在那個當下現身了，…，我覺得可以在特定的場合之中，獲得發展關係的一個契機。…（貓-B47、B48）；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有發生過性行為了，跟他講這件事情他好像比較容易接受。而且跟伴侶講了之後實質的幫助是，彼此了解彼此了，我也比較

¹半性戀(demisexuality)，意旨一個人只對跟他有情感連結(emotional bond)的人感到性吸引，呈現還是能感受到性慾。



不需要逃避，不用再假裝或是找藉口之類的（F-B12、B13）。

肆、討論與建議

針對研究發現與既有文獻之關鍵異同加以討論，借鑒國內最早一篇性少數現身之實證研究，以現身考量、策略與後果作為關注的焦點（畢恆達，2003），本文以開放地態度探究蒐集資料，為了勾勒無性戀現身的全貌，並不特定聚焦特定單一現身對象，探究理解無性戀現身經驗。

一、無性戀能見度低影響現身經驗

（一）無性戀現身等於需要解釋什麼是無性戀

過去性少數對於非異性戀身分認同常與同性戀恐懼症（homophobia）、內化恐同（internalized homophobia）有關，擔心社會汙名而導致同志族群難以開口承認自己的身分，生活上有「出櫃」和「入櫃」的困境，將現身形容成是躲在衣櫃裡走出來（畢恆達，2003）。然而，本研究受訪者卻常因為無性戀一詞在社會並不為人知而有所困擾，某個程度來說「無性戀現身」等於「需要解釋什麼是無性戀」。無性戀面對不同現身對象時，必須考量「如何解釋」成為現身的困境。而過去無性戀相關的研究結果，也有相似的發現，包含擔心解釋上的麻煩（李亭萱，2021）、擔心伴侶因為不理解無性戀而造成關係上的麻煩（王泓亮，2014），而這裡的不理解，指的並非理解其心情，而是不理解「無性戀是什麼？」

部分無性戀「為了避免麻煩」而選擇暫時不現身，這裡並非「入櫃」或「隱身」的思維，而是純粹人際互動上的考量，例如，東東說，即使同學們都了解同性戀，無性戀概念不需要從同性戀開始解釋，但無性戀還是太難令人理解了。然而，若讓無性戀者嗅到對方「有能力理解」，無性戀是願意解釋的，而這個指標在每個人的心裡並不相同。這與張雅惠等人（2017）發現雙性戀女性主動向伴侶出櫃，自己會摸索出一套評估的機制相似的，雙性戀女性雖然很想告訴伴侶，若伴侶能夠通過雙女內心的評定條件，雙女會一點一滴地慢慢透漏雙性認同讓對方知道。只是，內心的指標和方式因人而異。

（二）無性戀現身是多次反覆全面不斷連續的行動

另外，相較於雙性戀女性的出櫃是「一點一滴地慢慢透漏」，無性戀的現身經驗是試圖想要解釋清楚，但必須要「用盡全力」說明無性戀一詞，而且看起來解釋之後的結果並不理想。「本研究發現無性戀現身之後有 2 個正向的結果，2 個負向的結果。前者是「進一步探究相關知能」和「趨近理想關係」，能夠讓現身對象理解自己，但大部分的受訪者著墨於後者「難以被理解」和「容易被病理化」兩個結果。例如，三花貓說自己大費周折的解釋完無性戀之後，即便男同志的朋友當下能理解，但事後還是以異性戀的方式對待之，造成已經現身卻沒現身一般的「詭譎」。



雖然無性戀與同性戀現身之後，都可能被忽視性身分，但本質上完全不同。同性戀被忽視與恐同有關，但無性戀被忽視並非因為害怕無性，反而是與「不為人知」、「能見度低」和「難以彰顯身分」有關，這也呼應上一段落無性戀必須用盡全力彰顯自己的身分。受訪者三花貓用一隱喻闡述有性戀與無性戀彼此的隔閡：

我沒有吃過茄子，不知道茄子是什麼感覺，…。可是如果像是有情慾的人，他也沒有辦法想像那種…感覺不到是怎麼一回事（貓-B19）。

事實上，某些現身對象當下聽得懂解釋，但是無法在生活上自在互動，也無法有意識地與無性戀談話，尤其是感情議題。受訪者三花貓給了一個說法是好像沒辦法「接地氣」。

本研究推測原因有三：其一是無性戀樣本數太少，生活上少有如何與無性戀聊感情的基模，有性戀無法有意識地調整；其二是多數有性戀與友人們談感情同時涵蓋浪漫愛和性吸引力，但無性戀的感情與生活是如何的呢？社群內少有人討論，學術界也尚未有具體的產出，造成圖像上的空缺，相當值得進一步探究；其三是有性戀與無性戀少有對話，相互不理解彼此，在異性戀霸權和有性戀強勢文化之下，雙方不知道如何在感情與生活上好的互動，有性戀不清楚如何「表現」能夠尊重對方，這部分值得進一步思考與探究，才能讓具體實踐於生活之中。

相較於過去性少數的文獻中談論的「現身」是一個動態、連續性，不知何時停止的歷時過程（黃玲蘭，2005），無性戀現身也是動態的歷程，但更貼切地形容是：無性戀現身是多次反覆全面不斷連續的行動。過去文獻形容男、女同志的現身歷程是一點一滴，漸進式地顯露身分，從諸多外在表徵顯示，例如身邊朋友的性別以同性為多、成年之後沒有結婚的對象，穿著打扮幽微地「顯現」同志身分等（莊瑞君等人，2011；畢恆達，2003），而跨性別者的現身，在身分認同前後喜歡的裝扮，開始有第一次現身、第二次現身，以及改變外貌的第三次現身等（謝秋芳、趙淑珠，2016），過去性少數現身可以從「外在表現」開始有跡可循。

然而，Mollet (2023) 發現無性戀者多數是以「直接出櫃」為現身方式，因為已經預期現身對象並不理解無性戀是什麼，也知道不會有「爆炸性的結果」發生，如恐同、被逐出家門、家暴等，因此必須以開門見山的方式直搗黃龍。本研究也有相似的結果，發現無性戀現身不像過去性少數是以「擠牙膏」的方式，慢慢一點一滴顯露身分，反而需要「大量」、「全面」、「反覆」、「多次」說明自己的性傾向，策略上也用多種交織方式同步反覆進行，可以說是「用盡全力」地在現身這件事上，這不似過去同志族群期待他者「接受」自己，反而是期待他者「理解」自己，知道「無性戀是什麼」，這是無性戀現身的一大不同。研究者繪製表2 比較 LGBT 和無性戀現身不同的特性。



表 2
比較 LGBT 與 A 現身的特性

| | 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 無性戀 |
|------|---------------|---------------|
| 現身考量 | 恐同、恐雙、恐跨 | 怕麻煩、需要解釋 |
| 預期結果 | 期待對方可「接納」 | 期待對方可「理解」 |
| 現身策略 | 慢慢現身，如擠牙膏一般 | 直接現身，用盡全力多次行動 |
| 現身結果 | 病理化、被排擠、邊緣化…等 | 被忽視、不被理解、病理化 |

(三) 無性戀現身亦可能遭到性少數族群排擠

無性戀同時受到「異性戀霸權」和「有性戀強勢文化」影響，由於無性戀的能見度較低，因此許多同為性少數族群也不一定認識無性戀是什麼。本研究的受訪者三花貓原本想要參與同志友善機構，是為了協助與自己相同的性少數族群，但在面試時，因為該名男同志主試官並不理解「什麼是無性戀」，不將無性戀視為一個正式的性傾向，並奠基於「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性才是正常」的假設，認為三花貓應該要去接受治療，這與 Robbins 等人（2016）的研究結果相符，該研究表示不能期待每一位性少數都能理解，一位受訪者被男同志貶低為不正常的，並直指每一個人都應該想要發生性行為才是正確的。有意思的是，貶低無性戀者的對象都是「男同性戀者」，雖然這是單一事件，但可以再進一步思考就過去文獻指出男同志的性相較於女同志活躍，也較容易討論與實踐開放式關係（劉安真，2017；謝文宜等人，2017），也可能導致男同志無法理解無性戀的樣貌。而退一步來說，無性戀群內的異質性高，有浪漫愛（romantic asexual）、同性浪漫愛（homoromantic）、男性（male）交織的無性戀者，在社會上的處境可能更容易被排擠，更為艱辛。

二、「臺灣同性婚姻」對無性戀現身獨具意義

臺灣同性婚姻於無性戀現身處境具有特殊性且獨具意義，無性戀於（1）現身考量上，常有實踐社會正義的思維，現身並非為了無性戀主體，而是為了「挺同志」。而在個人平台網頁現身，說明每一個人的浪漫關係不需要他者的核可，某個程度上也是為了性少數整體權益而發聲，呼籲社會大眾能接受多元。另外，無性戀也從欲現身對象對同性婚姻的態度而選擇現身與否，並且細膩地觀察其細微的態度，而非僅有支持和反對二元對立，例如小正說「他們（父母）願意投同意票讓同性戀結婚，但是他們不同意自己的小孩是同性戀」，無性戀者可以在他人討論同性戀主體時而判斷該對象是否能接受多元；（2）現身策略上，以討論「同性婚姻」作為起始點等等，先提供同性戀或酷兒等知能，再進一步以無性戀身分現身，而值得一提的是（3）現身結果也因為臺灣同性婚姻之後有不同的轉變，



如三花貓於 2014 年在某性別友善機構現身後被歧視、病理化無性戀的情況，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開始正視無性戀的存在，並舉辦許多茶會、座談會，邀請無性戀者現身說法，提升台灣社會性別意識，協助增加無性戀能見度不遺餘力。

三、無性戀現身與當代「性腳本」有關，向伴侶現身尤為挑戰

Simon 和 Gagnon (1984) 提出性腳本是由文化場景、心理內化腳本、人際腳本，相互影響而成的，涵蓋了社會學和心理學兩個向度，說明人的性行為會受文化脈絡與心理層次而有固定的反應。傳統上，異性戀伴侶依循著不同性別而有特定的性腳本，男性往往被要求勇猛威武、主動侵略，女性被期待純潔矜持、被動柔順，好的性建立於穩定關係之上，部分有共同信仰的伴侶，則必須建立在婚姻基礎之上；同性戀伴侶也有其性腳本，普遍來說，男同志的性活動較為活躍，開放式的性被認為是可接受的，女同志的性活動較低，容易陷入死床 (bed death) 危機，沒有性生活被認為是可被接受的（劉安真，2017）。李亭萱（2021）提出無性戀現身處境須同時考量「生理性別」和「浪漫愛對象」的性腳本。本研究發現無性戀向伴侶現身經驗較為複雜。

（一）無性戀男性受到「男子氣概」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無性戀現身時受到性腳本的影響，尤其對象是伴侶時，現身經驗相對多元複雜。舉例來說，Frederick 向女友現身後，女友說：「所以你吃素喔？」某個程度上隱喻男性的性腳本是「吃葷」，語句結構上呈現男性「應該」要有性才是正常的思維，而 Frederick 也談及因為自己在性上還是可以配合的，要評估伴侶是否能接受再考慮現身。過去性少數男性現身的思維相似，已經走進異性戀婚姻的男同志，出櫃的動機在於已經完成丈夫和親職的任務（盧睿亭，2018），以及已婚雙性戀男性傾向在婚姻裡完成社會期待的任務，如做好老公、好父親等（侯政男，2019）。這表示男性覺得還是可以照著社會主流期待行動。本研究發現無性戀男性傾向在交往前先隱身，待關係穩定之後討論開放式關係的可能性。例如 Frederick 表示：

如果我真的想要交伴侶的話，…那基本上會談到這個是確定之後，我才會做接下來的事情 (F-B19)；

我是真心支持開放式關係，而且我是多伴侶關係實踐者，因為我自己不想要（性），那我希望我的伴侶自己去找一個 (F-B15)。

雖然本研究並非聚焦於伴侶親密關係互動，但未來可進一步探究無性戀伴侶互動樣貌。

（二）隨著當代女性擺脫傳統性腳本，無性戀女性現身挑戰更大

Foster 等人 (2019) 以不同種族文化的無性戀女性作為研究對象，發現「無性」對於女性來說現身並非特別困難，尤其是亞洲文化要求女性必須保有「貞潔」，甚至認為無性是品格高尚，值得表揚的一件事。然而，本研究發現：無性戀女性現身經驗會隨著當代性腳本的變遷而有不同的挑戰。



Yarber 和 Sayad (2013/2018) 指出當代男女的性態度與性行為趨於平衡，許多女性可擺脫忠貞、貞潔等舊時形象，女性表達性是正向的，認為性慾的滿足必須由雙方共同參與，性伴侶需負同等的責任，以及情慾歡愉是雙向交流的等。這些都是鼓勵女性擁有主體性，不要被男性牽制而對性有負向觀感，但某個程度上這些性腳本皆奠基於「每個人都應該有性」的假設上，這樣的變遷讓無性戀女性現身經驗多一層挑戰，尤其是向伴侶現身時。例如（N）表示：

我曾經也覺得我是處女，我只要有性我可能就有籌碼。因為我是女生，我可以利用這個來綁住我喜歡的人，但後來發現我根本就沒有籌碼，…這根本就是一個不平等的競爭 ((N) -B47)。

受訪者（N）談及處女與將性視為籌碼，是站在舊有以貞潔為標竿的性腳本思考，而現今社會上鼓勵女性表達性，隱含著鼓勵女性從「無性」變成「有性」，這是無性戀女性現身的挑戰，而（N）在交友平台上也特別標示「半性戀（demisexuality）」，呈現還是能感受到性慾。某個程度上這也反映了無性戀女性深受有性戀強勢文化影響，認為「有性慾」能站在較為有利的位置，可以增加尋找伴侶的優勢。

Gupta (2019) 以「性別化無性戀（gendering asexuality）和無性戀化性別（asexualizing gender）」作為主題，探討性別與無性戀的關聯性，發現「陽剛特質（masculinity）」和「陰柔特質（femininity）」有其影響力，分別指稱男性面對伴侶約會時必須克服主動調情，普羅大眾認為正常的階段，女性面對伴侶時，因為性觀念逐漸開放，而讓親密關係受到極大的影響，無性戀女性也可能遭受「非自願但合意性行為（unwanted but consensual sex）」或性侵害（sexually assaulted），其中白人中產階級女性更為嚴重。由以上可得知，無性戀向伴侶現身的考量、策略與結果更為複雜。

四、建議

（一）研究建議

本研究強烈建議學術界持續保持關注與探究。目前國內文獻嚴重匱乏，10年內僅有 5 篇可參考（尤千萍，2021；尤千萍、施俊名，2022；王泓亮，2014；李亭萱，2021；郭旗成、林燕卿，2023），除了首篇「無性之愛：性化社會下的無性戀經驗探究」，是探究無性戀生活經驗的實證研究之外（王泓亮，2014），其中 2 篇是碩士學位論文改寫發表，以描述性統計討論了無性戀研究的趨勢與發展（尤千萍，2021；尤千萍、施俊名，2022）、「臺灣無性戀者於華人文化之現身處境」則是以文獻回顧的方式探究無性戀者生活經驗（李亭萱，2021），「性少數中無性戀研究脈絡及建議」是以梳理性行為和性傾向相關文獻，試圖加深國人對無性戀族群的理解（郭旗成、林燕卿，2023），僅僅 5 篇的研究對無性戀的認識十分有限。

本研究為實證研究，奠基于李亭萱（2021）提出的無性戀者現身處境須同時考量「生理性別」和「浪漫愛對象」的性腳本，進一步發現無性戀的現身對象是



「伴侶」時尤為挑戰，並且隨著當代性腳本的變遷，無性戀男性受到「男子氣概」的影響，以及無性戀女性雖然可以擺脫忠貞、貞潔等舊時代的枷鎖，但社會鼓吹享受情慾與表達歡愉的風氣，仍是建立在「每個人都應該有性」的假設上，讓無性戀女性向伴侶現身的挑戰不減反增。本研究是以初探研究，對無性戀者現身經驗做一了解，未能聚焦於「無性戀者向伴侶現身經驗之探究」較為可惜，建議未來研究可以聚焦於此，更深度地了解無性戀者與伴侶互動狀況。

最後，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招募多軸線浪漫愛與性吸引不同組合之研究對象，或是就單一類型無性戀進行探究，前者能拓展廣度有普遍性的理解，後者可強化深度對單一群體深度理解，對於無性戀者有大大幫忙，不僅能提升群內無性戀產生普同感，也能更進一步建構知識，尤其是親密關係。

(二) 實務建議

無性戀一詞能見度低貫穿無性戀現身考量、現身策略和現身結果，影響整體現身經驗。國內外文獻皆談及「日常生活沒有無性戀的影子」，不論在課堂上、同儕互動、影視作品都鮮少有無性戀的生活樣貌，這影響著無性戀的現身經驗，研究也顯示無性戀者沒有興趣向醫事人員現身，且有至少半數的無性戀者自陳與醫事人員溝通時，被視為一種疾病，且期待能積極治療，並在某些時刻流露出無法理解當事人的狀態 (Flanagan & Peters, 2020; Gupta, 2017)，而被同為性少數族群病理化的經驗，也是無性戀者現身的困境 (Robbins, et al., 2016)。因此，研究者認為在教育或教學現場，可以提供教師與學生「無性戀」概念，以提升無性戀的能見度；在諮詢實務的現場，實務工作者要積極反思自身的「性價值觀」，以及擴展「性相關議題」之視框，除了增加對各個性傾向關注度之外，必須胸懷性少數的多樣性，避免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才不致在助人工作的成效上陷入盲點與困境，對性少數與臺灣整體社會有所貢獻。

收稿日期：2022.08.18

通過刊登日期：2023.07.16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ber, T. (2008) : 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吳芝儀譯〕。濤石。(原著出版年：1998)
- Yarber, W.L., & Sayad, B. W. (2018) : 性的解析-美國大學性教育講義 1：身體、性別與各年齡層的性〔鄭煥昇譯〕。大家。(原著出版年：2013)
- 尤千萍 (2021) : 以系統性回顧暨內容分析國內外無性戀研究之發展脈絡與趨勢：自 2004 到 2021 年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樹德科技大學。



- 尤千萍、施俊名（2022）。國內外無性戀研究之發展脈絡與趨勢。**性學研究**，12（2），17-36。https://doi.org/10.6206/SIS.202201_12(2).0002
- 王泓亮（2014）：無性之愛：性化社會下的無性戀經驗探究〔未出版碩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https://hdl.handle.net/11296/ktpb8e
- 王建權（2019）：恐同對待對同性戀和雙性戀男性之精神健康影響〔未出版博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https://hdl.handle.net/11296/77f2cn
- 江河清（2019）：評《酷兒同志：中國後社會主義時期的同性戀身分與同志政治》：酷兒也是同志，同志也是人民。**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5，143-151。https://doi.org/10.6255/JWGS.201912_(45).04
- 李佩雯（2018）：當「他們」也是「我們」：已出櫃同志與原生家庭之跨群體溝通關係維繫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8（1），65-101。
https://doi.org/10.6123/JCRP.2018.003
- 李亭萱（2021）：臺灣無性戀於華人文化下現身處境之探討。**輔導與諮商學報**，43（1），1-20。https://doi.org/10.3966/181815462021054301001
- 林美珠、溫錦真（2018）：臺灣心理與諮商敘事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3，81-116。http://doi.org/10.3966/172851862018100053004
- 侯政男（2019）：彩虹雲端世界的使用與滿足：臺灣已婚雙性戀男性之行動社交網路運用及尋求社會支持之關聯性研究。**性學研究**，10（1），1-27。
https://doi.org/10.6206/SIS.201907_10(1).0001
- 紀大偉（2015）：翻譯的公共：愛滋，同志，酷兒。**臺灣文學學報**，26，75-112。
https://doi.org/10.30381/BTL.201506_(26).0003
- 胡郁盈（2017）：從「現身」到「關係」：臺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0，107-151。https://doi.org/10.6255/JWGS.2017.40.107
- 紗娃・吉娃司（2009）：走過婚姻來時路～已婚女雙性戀伴侶關係之探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張雅惠、陳宇平、劉安真（2017）：女雙性戀對伴侶出櫃與否之經驗探究。**性學研究**，7（2），1-34。https://doi.org/10.6206/SIS.2017.0702.01
- 畢恆達（2003）：男同性戀與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37-78。https://doi.org/10.6255/JWGS.2003.15.37
- 莊瑞君、陳慶福、劉安真（2011）：女同志向家人現身歷程之敘說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9，71-104。https://doi.org/10.7082/CJGC.201104.0071
- 郭旗成、林燕卿（2023）：性少數中無性戀研究脈絡及建議。**樹德科技大學學報**，25（1），65-75。
- 陳詩婷（2014）：在愛裡悠遊—雙性戀者伴侶互動經驗與婚姻態度之敘說〔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
- AVEN 繁體中文版（無日期）：無性戀中文社群。2024年01月22日，取自
http://zh.asexuality.org/zh-hant/%e9%97%9c%e6%96%bc%e7%84%a1%e6%80%a7%e6%88%80/



- 黃玲蘭（2005）：從「同性戀認同歷程」談女同志的現身壓力與因應策略。元培學報，12，35-51。<https://doi.org/10.30171/JYUST.200512.0003>
- 劉安真（2017）：同志伴侶關係與諮商。輔導與諮詢學報，39（1），19-38。
- 盧睿亭（2018）：異性婚男同志向其所組家庭出櫃歷程之敘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https://doi.org/10.6345/THE.NTNU.DEPC.002.2018.F02>
- 謝文宜、陳雯隆、曾秀雲（2017）：台灣同志長期伴侶關係的正向經營策略。台灣性學學刊，23（1），53-79。<https://doi.org/10.3966/160857872017052301003>
- 謝秋芳、趙淑珠（2016）：跨性別者現身前後與家人互動之變化歷程。中華輔導與諮詢學報，45，1-32。

英文部分

- Barefoot, K. N., Smalley, K. B., & Warren, J. C. (2017). A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the health-care disclosure experiences of rural and nonrural lesbians. *Stigma and Health*, 2(3), 195-207. <https://doi.org/10.1037/sah0000052>
- Bogaert, A. F. (2004). Asexuality: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a national probability sampl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1(3), 279-287. <https://doi.org/10.1080/00224490409552235>
- Bogaert, A. F. (2006). Toward a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asexualit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0(3), 241-250. <https://doi.org/10.1037/1089-2680.10.3.241>
- Bogaert, A. F. (2015). Asexuality: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52(4), 362-379. <https://doi.org/10.1080/00224499.2015.1015713>
- Brotto, L. A., Knudson, G., Inskip, J., Rhodes, K., & Erskine, Y. (2010). Asexuality: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9(3), 599-618.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08-9434-x>
- Brotto, L. A., Yule, M. A., & Gorzalka, B. B. (2015). Asexuality: An extreme variant of sexual desire disorder? *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12(3), 646-660. <https://doi.org/10.1111/jsm.12806>
- Carrigan, M. (2011). 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sex? Difference and commonality within the asexual community. *Sexualities*, 14(4), 462-478. <https://doi.org/10.1177/1363460711406462>
- Cavanagh, S. L. (2019). Queer theory,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ymptom: A Lacanian reading. *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20(4), 226-230. <https://doi.org/10.1080/15240657.2019.1673974>
- Cowan, T., & LeBlanc, A. (2018). Feelings under dynamic description: The asexual spectrum and new ways of being.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38(1), 29-41. <https://doi.org/10.1037/teo0000076>



- Eaton, A. A., & Rios, D. (2017). Social challenges faced by queer Latino college men: Navigating negative responses to coming out in a double minority sample of emerging adult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3(4), 457-467. <https://doi.org/10.1037/cdp0000134>
- Foster, A. B., Eklund, A., Brewster, M. E., Walker, A. D., & Candon, E. (2019). Personal agency disavowe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asexual women of color.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6(2), 127-137. <https://doi.org/10.1037/sgd0000310>
- Forenza, B. (2017). Exploring the affirmative role of gay icons in coming out. *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6(4), 338-347. <https://doi.org/10.1037/ppm0000117>
- Flanagan, S. K., & Peters, H. J. (2020). Asexual-identified adults: Interactions with health-care practitioner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9(5), 1631–1643.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20-01670-6>
- Gupta, K. (2017). What does asexuality teach us about sexual disinterest? Recommendations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based on a qualitative study with asexually identified people. *Journal of Sex & Marital Therapy*, 43(1), 1-14. <https://doi.org/10.1080/0092623x.2015.1113593>
- Gupta, K. (2019). Gendering asexuality and asexualizing gender: A qualitative study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s between gender and asexuality. *Sexualities*, 22 (7-8) , 1197-1216. <https://doi.org/10.1177/1363460718790890>
- Galupo, M. P., Mitchell, R. C., & Davis, K. S. (2015). Sexual minority self-identification: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complexity.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2(4), 355-364. <https://doi.org/10.1037/sgd0000131>
- Greaves, L. M., Barlow, F. K., Huang, Y., Stronge, S., Fraser, G., & Sibley, C. G. (2017). Asexual identity in a New Zealand national sample: Demographics, well-being, and health.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6, 2417–2427.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17-0977-6>
- Goldberg, A. E., Ross, L. E., Manley, M. H., & Mohr, J. J. (2017). Male-partnered sexual minority women: Sexual identity disclosure to health care providers during the perinatal period.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4(1), 105-114. <https://doi.org/10.1037/sgd0000215>
- Henderson, M. G. (1998). Disclosure of sexual orientation: Comments from a parent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8(3), 372-375. <https://doi.org/10.1037/h0080346>



- Hinderliter, A. C. (2009). Methodological issues for studying asexuality. *Archives of Sexuality Behavior*, 38, 619-621.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09-9502-x>
- Huang, J., Chen, E. C., & Ponterotto, J. G. (2016). Heterosexual Chinese Americans' experiences of their lesbian and gay sibling's coming out.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7(3), 147-158. <https://doi.org/10.1037/aap0000051>
- McKay, T. R., & Watson, R. J. (2020). Gender expansive youth disclosure and mental health: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gender identity disclosure.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7(1), 66-75. <https://doi.org/10.1037/sgd0000354>
- Mollet, A. L. (2023). "It's easier just to say I'm queer": Asexual college students' strategic identity management. *Journal of D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 16(1), 13-25. <https://doi.org/10.1037/dhe0000210>
- Nigianni, C. & Voela, A. (2019). Psychoanalytic Practice and Queer Theory: Queering the Clinic. *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20(4), 234-237. <https://doi.org/10.1080/15240657.2019.1673976>
- Prause, N., & Graham, C. A. (2007). Asexuality: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6(3), 341–356.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06-9142-3>
- Riggle, E. D. B., Rostosky, S. S., Black, W. W., & Rosenkrantz, D. E. (2017). Outness, concealment, and authenticity: Associations with LGB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well-being.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4(1), 54-62. <https://doi.org/10.1037/sgd0000202>
- Robbins, N. K., Low, K. G., & Query, A. N. (2016).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coming out" process for asexual individual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5, 751–760.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15-0561-x>
- Scherrer, K. S. (2008). Coming to an asexual identity: Negotiating identity, negotiating desire. *Sexualities*, 11(5), 621-641. <https://doi.org/10.1177/1363460708094269>
- Schrimschaw, E. W., Siegel, K., Downing, M. J., Jr., & Parsons, J. T. (2013). Disclosure and concealment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non-gay-identified, behaviorally bisexual m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81(1), 141-153. <https://doi.org/10.1037/a0031272>
- Simon, W., & Gagnon, J. H. (1984). Sexual scripts. *Society*, 22, 53-60.
- Wheatner, D. (2018). *I fell in love with an asexual: Navigating needs without blame when you like sex, your partner doesn't, & asexuality is a possibility*. Divergent Drummer Publication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Disclosure Experience of Taiwanese Asexuals

Ting-Hsuan Le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isclosure experience of Taiwan asexual by interviewing six Taiwanese asexual individuals. Using a narrative research approach, we analyzed the data through the "category-content" method.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the results. Firstly, considerations to disclosure their asexuality is influenced by the people they are interacting with. For instance, disclosure to their family is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daily relationships, how accepting and open-minded to queer knowledge they are; disclosure to friends and communities is part of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increasing common sense of queer individuals, practicing social justice, and challenging old frameworks; disclosure to partners put them into the risks of not being understood and forming false expectations. Secondly, disclosure strategies include starting the discussion with the concept they already known, sharing views and feelings in daily life, and avoiding being put themselves into a difficult situation where everyone knows nothing about asexuality; Thirdly, the challenges include being misunderstood, easy to be pathological, further exploration of related knowledge, and closer to ideal relationships. The most challenging thing to asexual people is disclosure to their partner. Asexual people consider whether the disclosure is good for relationship or not, and the purpose of disclosure is hoping their partner hold no incorrect expectations.

This study discusses as follows. (1) the low visibility of asexuality affects the experience of disclosure, and it is a repeated and comprehensive a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asexuality comes out" equals "needs to explain what asexuality is". Some Asexual individuals choose not to come out temporarily because of "to avoid trouble". This is not "in the closet" or "go invisible", but a purely interpersonal consideration. (2) Disclosure is related to the contemporary script and telling to their partners is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Asexual men influenced by "masculinity" and asexual women feeling challenged to appear as contemporary women are all making attempt to break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sexual scripts (3) Taiwan same-sex marriage plays an unique and meaningful role for asexuality and this facilitates consideration of disclosure and practices social justice. In terms of strategies of disclosure, discussing "same-sex marriage" as a starting point as nowadays people have had a more friendly attitude towards same-sex marriage. In the end of the study,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based on the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Keywords: asexual, coming out, disclosure, sexual attraction, Taiwan

Ting-Hsuan Le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lee_ting_hsuan@yahoo.com.tw)

